

·执政党建设研究·

# 中国共产党维护中央权威 的历史经验与路径建构

王贺宇,郭文亮

(中山大学,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历史必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领导工人运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实践中,对何谓权威、为何要加强权威以及如何加强权威都作了深刻论述。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征程上看,维护中央权威始终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开展的必然要求。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要坚定维护中央权威,就要准确理解权威,科学对待权威,正确处理维护中央权威和发展党内民主的关系。

**关键词:**中央权威;历史经验;路径建构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8)09-0029-08

政党作为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代表的政治组织,是由特定阶级或者阶层所组成,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具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性。为谋求新的政治发展,政党必须巩固自己的组织,必须明确自己的领导核心,并对这个核心加以维护,保障这个领导核心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是把维护权威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sup>[1][250]</sup>进一步强调了维护中央权威重大意义,这对于在新时代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维护党中央权威,更好地推进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威的科学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对权威的维护和运用,经典作家关于权威的论述为无产阶级

**收稿日期:**2018-05-1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科学有效制约权力运行的保障机制、防范机制和惩戒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13AZD00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贺宇(1992-),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郭文亮(1953-),男,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执政党建设。

政党正确认识和利用权威指明了方向,也为新时代维护中央权威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批判巴枯宁主义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在建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围绕权威作了一系列经典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就规定了盟员必须做到:“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sup>[2](P572)</sup>成为盟员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其生活和活动方式要和同盟目的相符合,同时规定盟员要以纪律为准绳,防止密谋活动。《章程》还在组织机构上规定,党的代表大会为全盟的立法机关,作为全盟权力执行机关的中央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初步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以《章程》为纲领是进一步强调了同盟的权威。19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国际,声称反对任何权威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建立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社会,鼓吹“各支部自治”“委托”和“各自治小组自由联合”,大肆攻击、诋毁、诬蔑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原则”,导致在第一国际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述了权威的内涵及其重要性。1873年,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对权威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解释:“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sup>[3](P224)</sup>针对巴枯宁分裂分子提出的“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sup>[4](P608)</sup>“宣告其他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独断的、致人死命的”,<sup>[5](P28)</sup>“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废除之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sup>[3](P227)</sup>等谬论,恩格斯指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sup>[3](P227)</sup>彻底批判了反权威的巴枯宁主义者对权威原则的发难和攻击。此外,恩格斯在强调权威和服从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的同时,也提到权威和自治两者应该是相对的东西,而不能将二者绝对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sup>[3](P227)</sup>维护权威具有时间上的长期性和持久性,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需要有足够的权威作为支撑,从而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在建立新政权后,更需要有一定的权威作为保障,从而利用权威对这个新政权进行组织、建设、巩固和强化。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指出:“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sup>[3](P227)</sup>“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sup>[4](P606)</sup>进一步强调维护权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

列宁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特有的状况和环境,也对维护中央权威、保障党的团结统一作了重要论述。列宁从俄国党内存在的组织涣散的实际出发,强调要加强组织建设,树立党的权威,并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sup>[6](P252)</sup>,是按照部分服从整体、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建立起来的“集中制的党”和有机统一的整体。针对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少数派妄图以部分党员拒绝服从中央机关领导的卑劣手段,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强调:“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sup>[6](P363)</sup>同时,列宁明确指出了纪律就是“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sup>[7](P121)</sup>为维护和加强中央权威,列宁指出:“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sup>[8](P254)</sup>在此基础上,列宁还认为,派别活动是和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背道相驰的。他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中强调,因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sup>[9](P78)</sup>,因此必须“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sup>[9](P83)</sup>。1921年3月,俄共(布)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定》,要求严禁派别活动,解散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一切派别集团。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巩固和建设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经济派”“取消派”“民主集中派”“缓冲派”等派别组织,列宁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力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

团结和统一,强烈抨击了背离原则的派别活动,有效地维护了中央权威。

## 二、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维护中央权威的成功经验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权威的提出和维护

维护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早在建党之初,中共就十分重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威问题的论述,并使之成为贯穿于党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关键问题。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第12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sup>[10](P9)</sup>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从不同层面强调了中央权威。《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党的纪律方面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sup>[10](P62)</sup>要求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的二大从实体的规章守则上强调了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并在制度上对中央权威给予保障。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共对待权威问题受到两种错误行径的干扰,一种是“家长制”“一言堂”现象,另一种是“极端民主化”现象。由于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正确和有能力的领导核心,导致中央权威得不到应有的维护,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央权威得到了有效维护,才使党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局面。总体上看,从建党之初到这一时期,中共对权威问题的认识还处在幼年阶段,在重视中央权威的同时还存在许多不成熟的现象。

在抗战爆发后,随着党内外、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对权威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且在行动中躬身践行维护中央权威的原则,成功处理了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针对张国焘和王明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等错误行为,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阐述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党内法规,目的是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确保和中央步调一致,使中央权威得到了有效的强化,使全党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空前的团结,中央权威得到了根本的维护,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实行严格的集中统一领导,相继颁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旨在加强党的领导、维护中央权威的规章制度,强调要以严格的纪律为遵循,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从而克服了长期游击战争而形成的党内军内不良风气和无政府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也进一步从规章制度上保障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了中央权威。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央权威的维护和扭曲

建国之初,为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有效维护中央权威,1949年,中共中央先后做出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提出:“凡党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sup>[11](P10)</sup>从而在执政之初加强了党中央的权威。1953年,党慎重地处理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并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12](P126)</sup>《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反对任何妨害

党中央统一领导、破坏中央威信的行为。1956年,党的八大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新章程中突出强调了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进一步强调只有保障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宗派和分裂活动,才能强化党的领导核心,维护中央权威。

然而,由于受到各种来自国内、国际的复杂因素影响,加之缺乏经验,一些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没有很好地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逐渐遭到破坏,中央权威逐渐遭到严重削弱。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个人专断和“大民主”开始滋长。在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践踏。“文革”开始后,形成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局面,运用“大民主”为主要斗争方式,否定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使全党逐渐陷入瘫痪状态,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被打乱,相继产生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使中央权威遭到空前削弱。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中央权威的维护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作用,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保障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为切实解决维护中央权威中出现的问题,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强化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维护了中央权威。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又做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把“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sup>[13](P37)</sup>作为列举的“三种人”的具体表现之一,进一步强调了要巩固党中央权威。1992年,党的十四大就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对中央权威的维护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指出“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决不允许有任何破坏和分裂党的行为存在”。<sup>[14](P130)</sup>1998年到2000年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强化了党员干部对中央权威的维护意识。2003年8月,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并相应地组建了中央巡视组,通过完善党内监督不断巩固中央权威。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就增强党内团结统一、切实维护中央权威作了相应的论述,指出全党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切实保障政令畅通。至此,中央权威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强化和维护。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维护中央权威的新论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征程上,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维护中央权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从而使中央权威不仅在理论上、实践上而且在制度创新上得到更好地维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对中央权威的维护。习近平先后在2013年6月的《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9月的《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法宝》和《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党内民主时,必须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自由主义,为有效维护中央权威、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出要增强“四个意识”,将维护中央权威的认知和理解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先后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等集中教育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党员干部对中央权威维护的意识,针对消极对抗中央决策部署、对中央阳奉阴违等问题进行了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同时,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党中央以推进党的制度改革为着力点,修订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以逐步完善制度体系,切实加强对中央权威的维护。从党的自身建设出发,先后查处了周永康、薄

熙来、徐才厚、令计划、孙政才等违法乱纪的高级领导干部,消除了弱化甚至对抗中央权威的政治隐患,有效确保了全党令行禁止、中央政令畅通,凝聚了全党的向心力、聚合力、战斗力。

党的十九大更是从“四个伟大”的高度出发,指出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上,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sup>[1](P50)</sup>。中共十九大后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又进一步要求党员干部要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维护中央权威予以原则规定上的保障,强调了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意义。

维护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征途上之所以能不断克服前进中巨大的困难,取得如此伟大的业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权威的高度维护。

### 三、现实思考:新时代维护中央权威的路径建构

#### (一)在思想认识上厘清维护中央权威的内涵与意义

维护中央权威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需要,是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号召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就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要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自觉维护好党中央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的权威,使之在党员干部中形成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聚合力和战斗力,确保党始终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新时代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要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领导核心”所包含的三重本体内涵,从而进一步廓清维护中央权威的核心要义和深层内涵。从国家社会的全局层面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从政党层面上看,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党的领导核心,在全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在这个领导集体当中党的领袖又是核心,作为这个领导层中的关键核心,在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和推进治国理政新实践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sup>[13](P310)</sup>一个现代政党要想持续稳定地发展,就必须不断强化和维护这个政党的领导核心,保障这个领导核心的权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使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正是因为不断坚持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了对领导核心的维护,从领导核心在国家和政党两个层面上所包含的三重本体内涵上进一步强调了维护权威的重大意义,在实践维度上对维护中央权威进行了生动诠释,才根本上改变了一段时期来管党治党的宽、松、软的状况,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无数事实证明,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首先是明确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不仅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更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只有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取得长远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

此外,维护中央权威还要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维护中央权威和中央过度集权具有本质区别,维护中央权威并不是将强化中央权威和发挥地方主动性、创造性对立起来。马

克思恩格斯在强调要正确理解权威和自治的关系时就曾提出：“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东西。”<sup>[3](P226)</sup>而不能将权威和自治绝对化，更不能将两者根本对立起来。伴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权威和自治应当在一定的范围内合理和正确地被应用，因此“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sup>[3](P226)</sup>现在我们维护中央权威，就要保证在全国政令统一和全局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做到合理而适当地分权，要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总之，要想有效地维护中央权威，就要坚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创造性，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厘清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才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做到既不会与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相矛盾，又不会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相违背。

## (二)在实际行动中坚定维护中央权威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为维护中央权威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保障，同时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当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维护中央权威，应着重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保障和有效途径。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核心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道路不动摇，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央权威。一段时期以来，在党的建设中，有的干部利欲熏心，大搞人身依附关系，是非观念淡薄，纪律性、原则性退化，有的党员干部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奉行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严重破坏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也为巩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央权威埋下了隐患。据十八届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九大的工作报告中显示，五年来，共立案审查违反政治纪律案件达1.5万件，处分1.5万人，其中中管干部有112人，这些数据也充分表明了党中央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习近平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sup>[15](P6)</sup>并深刻指出：“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sup>[14](P133)</sup>因此，只有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正确把握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实践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才能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从而达到高度的政治信仰和严格的纪律约束相统一，才能始终保持全党令行禁止，更好地坚持和维护中央权威。

二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首要的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广大党员干部的主要平台和进行党性锻炼的重要途径，集中体现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也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的党内政治生活包含的12条重要内容，其中就包括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将维护中央权威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从领导维度到实施内容上的有机统一，因为只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不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着力解决党内政治中突出存在的不正常、不认真、不严肃等问题，才能及时克服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等问题，纠正和预防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行径，有效阻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病症。因此，让党员干部充分在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大熔炉、大平台提高党性修养，自觉做到在政治方向要把握准而不走偏、在政治信仰要坚守好而不变、政治立场要站稳住而不移，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才能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三要厚植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集中整合党内的先进文化、优良传统、优良作风,规范和教化着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调节和净化着党内政治生态,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导向,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集中体现的是党员干部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树立,通过厚植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从实践层面上影响党员干部的活动。厚植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从内容上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维护中央权威的意识,在思想上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信念,通过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不断强化维护中央权威的文化内核。党内政治文化内蕴着党的信仰文化、组织文化、纪律文化、廉政文化等重要内容,覆盖着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厚植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有执着的追求,对党的纪律、规定、原则、制度等方面要有严格的遵从,这为坚定维护中央权威奠定了稳固的文化基础。维护中央权威需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厚植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正是从软约束的层面上,通过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坚决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从而增强党员干部维护中央权威的意识,通过厚植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使广大党员干部逐渐树立和强化正确的政治价值观,从而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

### (三)在制度机制上正确处理好维护中央权威与发展党内民主的关系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要正确处理好维护中央权威与坚持党内民主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使民主集中制成为维护中央权威、增强党内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习近平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sup>[17]</sup>因此,贯彻民主集中制首要的是看清楚维护中央权威不是要搞专断独行而不要党内民主,而是要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更好地维护中央权威,更稳定地发展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党的一大制度优势,更是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法宝。是否有效地遵循民主集中制,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曾发人深省地指出:“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sup>[18](P303)</sup>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并迅速瓦解,其中原因之一,正是苏共丢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党内派别林立、一盘散沙。从我党自身历史看,在党的长期实践中既积累了遵循民主集中制的有益经验,也有过教训。在历史上,就曾经一度有过民主不足或者集中不够等错误倾向。没有民主或者民主不足,往往导致“家长制”“一言堂”等个人专断现象。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为推行其错误的思想路线,将个人观点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使“一言堂”和“家长制”的危害不断扩大,既压制了党内民主,也破坏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削弱了中央权威。而没有集中或者集中不够,则会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弱化中央权威,常常导致组织涣散,党的凝聚力不够,使党失去生命力和战斗力。历史一再警示我们,如果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事业发展势必会受阻,党内团结也得不到根本保证。当前,落实好民主集中制原则,就要着力防范和纠正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错误行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科学把握民主集中制,必须正确理解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要不断创新党内法规制度和完善具体落实措施,从而推动民主集中制走向程序化、法规化、体系化、常态化。新时代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党上下更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只有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实行正确集中,才能及时集中正确意见,及时纠正不正确的意见和做法”。<sup>[19](P25)</sup>遵

循民主集中制,既要正确的民主,又要正确的集中;既要反对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又要防止个人独断专权。当前落实好民主集中制,就要坚持“四个服从”,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贯彻执行好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落实好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基层组织制度,不断强化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维护中央权威,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之上的。领导者要多听各方面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样才能凝聚全党共识,统一全党思想、统一全党意志、统一全党行动,形成正确的集中。因此,通过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才能更好地维护党中央权威,才能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 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巴枯宁.上帝与国家[M].朴英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6]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7]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1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文献选编(下)(1949.10-1966.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1993.
-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4]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一大到十八大(全三卷)(下)[M].河北: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
- [15]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7]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17-02-14.
- [1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9]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陈晓宏]